

# 问渠哪得清如许?勿忘湖北“小河南”

## 为南水北调源头丹江口水库建设跨省搬迁的大柴湖移民往事



▲移民们靠着肩扛车拉改造大柴湖。

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



▲丹江口水库河南浙川移民安置到湖北示意图。制图:闫天雷



▲乘船下湖北大柴湖的河南浙川移民。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

大柴湖,必定是好地方,“柴就是柴火,湖就有大米”。双河村缺水,要烧柴必须走上40里路到深山去砍才能得到。大米在双河也是稀罕物,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用两斤玉米换来一斤大米,“尝个新鲜,当肉吃”。

三天之后,移民们从钟祥大同码头上岸。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,到处都是水窝子。从码头越往里走越荒凉,脚下没有路,没走几步接待的车就陷进沼泽地里了,喘着粗气,车轮溅起的泥浆把推车的移民泼成了泥人。

### 咬牙扛下来的移民安置任务

全浙林跟着移民们跳下汽车,一脚深一脚浅地蹬着污水,硬着头皮钻进芦苇林,在当地移民接待站干部的引导下找到了自己的屋子。为了方便管理,移民还是按照在浙川的大队队别居住,大队称谓和干部都没变。

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刚刚砍过的芦苇地里,十间一排,矮矮的,就像部队的营房。全浙林一看,这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砖垒的,其他墙都只是芦苇秆糊上泥巴。

政策规定,每个移民分半间房,每间不足8平方米。当时,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几个人挤一张床。带着猪、羊的人家,没地方建圈棚,只能白天拴在门外,晚上拴在床头。

移民接待站为每户人家准备了两百块垒灶的砖、三十斤芦苇柴火、一个蓝墨水瓶的煤油灯和18块钱的搬迁安置补助。

一些来得早的移民尝试种了小麦,却没什么收成。“种下一葫芦,收不上来半瓢。”全浙林说,芦苇的根扎得很深,砍了挖了没多久又拱出地面,把小麦全给盖住了。

那些来得晚的移民没来得及开荒种粮,1968年10月份搬到柴湖时,移民杨俊道从老家带了300斤干红薯片,刚过完春节就已经吃光了。当年,杨俊道和很多移民一样只能买国家统销粮。杨俊道吃了三年的统销粮。当时每个成人按27斤/月凭证购粮,很多移民拿不出钱,只能先把粮证卖了换一半换成钱,再买粮食。

为了省点吃,一些移民把粮食磨碎了,本来一份粥的米分成几份煮,还有一些人只能磨来柳芽和榆钱,和上几颗粮食煮着吃。

吃水也是问题。大柴湖是个水窝子,却缺干净的水。井里打出的水,看着清澈,白毛巾、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黄。这水一煮开全是白沫,喝着还有一股难以咽下的腥臭味,连煮水的锅也结着厚厚一层水垢。一些移民为了喝上干净的水,去“刮”浅浅的堰塘里的水。

其实,大柴湖是咬着牙扛下安置移民任务的。一位移民接待干部回忆,移民安置工作压力巨大。大柴湖移民接待站的干部甚至买光了周边砖厂的砖。当时大柴湖实际安置的移民人数远远多于搬迁前统计的数量,面对背井离乡的移民,大柴湖不得不想尽办法安置。

大柴湖移民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湖北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。当时钟祥县移民指挥部副指挥员黄益洲索性就驻扎在大柴湖。每次下雨他就拄着木棍蹚着水,组织移民们排水,和移民们一样满身泥巴。

但是限于财力、限于当时的国情,彼时地方也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一下子解决大柴湖的问题,只能一边逐步解决,一边鼓励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。

“大柴湖是要变的。”绝大部分移民还是选择改造大柴湖,在这里安家。这时候,人们在一些屋子的墙上用石灰浆刷上了“战天斗地,人定胜天”的标语。

### “刨掉地里的芦苇根,治理好天上来的水,好日子就来了”

到大柴湖的第二年,移民们开始开荒种芦苇。大柴湖的芦苇是实心的,又粗又硬。老百姓喊这种芦苇为“钢柴”。那时杨俊道每天天不亮就下芦苇,直到腰都伸不直,胳膊也抬不起来才回家。即使这样卖力,好几天他才砍了一小垛。

砍“钢柴”确实累,得一根根地来,还得随身带着一块磨刀石,没砍几下就得磨一会刀。一些移民索性搬个小板凳,坐着砍,没一会板凳就陷进泥里了。那些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锋利坚硬的芦苇梗的,甚至被戳穿了脚。

砍过的芦苇地,得刨出芦苇根才能种地。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又深又硬,大锄头没刨多久就成了“铁和尚”。耕牛也不行,那时候牛瘦也不多,遇到芦根,三头牛还拉不动一张犁。

最后武汉军区派出了75匹东方红拖拉机,可下地没多久,不少拖拉机就出了问题,不是犁铧破了,就是后桥断裂。原来,大柴湖的淤泥里除了芦苇根之外,还有石头、树根,甚至石碑。这些拖拉机也没辙,再加上白天黑夜连轴转,免不了出故障。

拖拉机在前面开,移民就成群结队跟着后面捡芦根。最忙的时候,移民村里甚至大人小孩都去地里弯着腰刨芦根、捡芦根,从夏天一直干到寒冬。可即使这样,第二年一些地里还是又冒出了芦苇来。杨俊道记得,一直这么干了五年之后,地里的芦苇才渐渐被“赶走”。

杨俊道把麦子种到地里,可依然没多少收成。“一亩地就只能收几十斤的麦,哪块地要有一两百斤就算是丰收了。”杨俊道分析,“一是当时没什么肥料,二是大柴湖排水差,经常被淹,看着长得挺好的麦子,其实地下的根都烂了。”

1972年5月,杨俊道发愁收成时,听到一个好消息,附近军马场的200亩小麦,因为连着阴雨天耽误了收成成了霉,军马场索性放弃了。杨俊道和其他闻讯的移民捡了“便宜”,尽管已经变质,甚至出了芽,移民们还是小心磨成面当成宝。

再后来,公社组织移民把旱地改成水田,种植水稻。可没多久大部分水田又改回了旱地。原来,一方面移民没有种过水稻,怎么种谁也不知道,当地、气候的“脾气”也还没摸透。另一方面,移民们发现芦苇地表面一层薄土,底下却是深深的泥沙,水和肥都留不住。一些地里打好的井也因为成本太高荒废了。

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几年,治水和开荒造田一样,都是头等大事。治水得两手抓,一手筑堤防汉江水倒灌,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内涝。

1967年,荆州地区调集了京山、天门、荆门、钟祥和潜江五个县的数万民工与移民一起修筑了一条长达45.4公里的汉江防洪堤,耗费了土石共计6526万立方米。这些土石足够填满4.5个西湖了。这么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车推,此后每年,移民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加高围堤。

光有围堤还不够。有一年,汉江又发洪水,水已经漫到了围堤边上,“站在围堤上就可以洗脚了”,移民们不得不转移到更高的地方。所幸的是,

那次没有决堤。后来,每个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台,供移民躲避灾害,移民也叫它“保命台”。

除了担心围堤之外,移民们还得“一人一把铁锹,下雨就往外跑”。下雨的时候恰恰是查看地势高低、水流去向,查找排水渠“肠梗阻”的时机。当时铁锹就像每个人吃饭的碗筷一样必不可少,大柴湖周边的铁锹都卖断了货。

为了给大柴湖积水找出路,除了数不尽的小沟渠之外,移民们还在大柴湖东西面挖出了两条22公里长的主干渠,9条总长近百公里的支渠,还修建了两座排水闸。

挖渠排水工程是从1970年开始的,挖了七八年。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干,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闲。当时没有橡胶雨鞋,挖渠得先脱了解放鞋赤脚上。全浙林记得,1972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,人被冻得直哆嗦。一条赶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,沟里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。大家都在犹豫下不下的时候,时任大柴湖党委副书记的宋育英喊了一句:“共产党员跟我上。”就下到了刺骨的沟里汲水,没一会她的腿就冻成了“紫萝卜”。其他人也跟着卷起了裤腿。

“刨掉地里的芦苇根,治理好天上的水,好日子就来了。”大柴湖移民挖渠筑堤、刨芦星荒时,喇叭里的广播就这样给移民们“打气”。经历了约10余年的“战荒湖”,原来的芦苇荡成了庄稼地,一下雨膝盖都陷进去的沼泽路也变成了石子路。

### “要和本地人结婚,差点被拘留了”

1976年春节刚过没多久,移民曹明光就差点被法院拘留了。

起诉他的是吴健美的父亲。吴健美是他的相好,也是湖北钟祥本地人,长得漂亮。当时19岁的曹明光模样也俊,像当时流行电影《侦察兵》男主角王心刚。春节拜年时,两人在曹明光姨妈家一见钟情。

那时移民过得确实不如当地人。一些当地人瞧不起移民,本地人不愿意和移民处对象。曹明光和吴健美处对象的时候,本地人甚至已经能穿“的确良”衣服了,而大多数移民一年到头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。那件黑粗布衣服原本是解放军捐给移民的棉服。天热了,移民就把棉花扒了当单衣,等到天冷了再塞上。

曹明光当时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,吴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,他的床还拴着猪。年轻刚烈的吴健美没有嫌弃曹明光,可她父亲却不同意移民当自己的女婿。见拦不住女儿往曹明光家跑,他索性一纸状告曹明光拐卖了吴健美。

法院和派出所上门找曹明光的时候,他刚好外出,只留吴健美一人在家。

“这不是曹明光的错,新社会,我看上了他是我愿意的。要抓抓我。”吴健美说。

“这是你爸爸告的,你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。”

曹明光认定了吴健美,他索性借了一身当时时髦的白上衣、蓝裤子和白球鞋,上她家去。见曹明光的干净模样并非印象里移民形象,再加上女儿是铁了心,吴健美父亲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,却不愿出一分钱嫁妆。

上世纪80年代当了大柴湖党委书记的杨俊道说,当时镇里本来要调来一个本地人当妇女主任,可她一听说是到大柴湖来,宁愿被开除也不干。原来,她不完全是不嫌大柴湖移民穷,也因为听不懂移民说的河南话、吃不惯移民喝的苞谷粥。

曹明光和吴健美成了“名人”。一些本地人和移民开始“效仿”他俩,再遇到阻碍时,有人就说:“曹明光都结婚了,我们怎么就不能呢?”

可全浙林说,本地人和移民的融合光靠一两家结婚不管用。改革开放前,大柴湖本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直都有,当时劳动力也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地流动,再加上本地人和移民时不时的摩擦,移民一代和大部分移民二代就在相对封闭的移民社区里学习、工作和生活,以至于大柴湖的高中被撤销之后,移民三代不得不去钟祥市里上高中时,才发现自己和本地人说的话并不相同。

“这种集中安置的移民搬迁模式,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风俗习惯,另一方面却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去。”全浙林说,“真正的融合是改革开放之后,移民生活逐渐好转,和本地人交往变得频繁之后开始的。”

### 正把“柴湖”变成“财湖”

1995年高中毕业之后,移民二代马强到钟祥跟着位老师傅学厨艺。当时一口河南腔的马强还被一起学艺的本地学徒嘲笑了。等到几年前,自己的孩子到钟祥上学时,“几乎没有本地人和移民的观念了,更谈不上谁瞧不起谁了。”

马强记得明显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前后。那时候,移民的芦苇房变成了砖瓦房,再后来变成了楼房。大柴湖的变化惹得本地人也羡慕:“大柴湖真不一样了。”

在大柴湖一些移民村里,还保留着一两间加固过的芦苇房和一些过渡房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父亲马季洲用泥巴混上麦糠建了2间土偏房。当时,马强和哥哥姐姐个头长得快,那间唯一安置房已经住不下了这么多了。每次一刮风下雨,母亲怕偏房塌了,就赶紧喊住他们出来。

到了1989年,这几间泥巴房、芦苇房换成了红砖大瓦房。“1982年分产到户之后,移民们开始发展副业,多种经营。”马强解释,“与此同时,哥哥姐姐们都南下打工,吃饭的少了,挣钱的多多了。”

1983年,大柴湖党委书记杨俊道提出“立足八分地,打好翻身战”的口号。移民从人均八分的地里挖出的第一块“宝”是麦冬。麦冬喜欢沙地,种植技术也不难,当时每公斤价格在二三十块钱左右。不少吃螃蟹的移民尝到了甜头。

移民从地里挖出的第二块“宝”是蒜薹。大柴湖种出的蒜薹成熟早,产量也高,每到蒜薹上市的季节,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新疆等地的收购商就涌进大柴湖。一些蒜薹甚至远销日本、韩国。

一些人不甘心在土里刨食,把家门一锁,背上被褥外出务工。马强记得,上世纪90年代初,打工一年能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留在家里的家长们在邮局门前排队,等着取外出务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。

(下转10版)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### “一条扁担两个筐,收拾收拾下钟祥”

全坑村的临时码头是乱得不能再乱了。当时18岁的全浙林只记得到处都是人,几乎所有人都在哭,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兴。

人们要么坐在卡车上探出身哭着道别,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着泪朝岸上挥手。谁也没时间在注意墙壁上刷的“为革命搬迁”标语。1968年初,移民搬迁工作队进了村,村里的空墙都刷上了这条标语。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,后来水涨上来,成了临时码头。

全坑村隶属于河南淅川县,当时差两天就是端午节。母亲坐卡车走陆路,全浙林押着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 and 一口箱子走水路。船上家家户口的家当,石磨、犁耙、水缸、桌椅、箱柜、耕牛,甚至是老寿木……摆得满满一船。一些人临上车前还刨了半袋黄土带上,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块自家院子铺的青石板。

“一条扁担两个筐,收拾收拾下钟祥。”全浙林回忆,其实没什么值钱的家当,移民们把能带走的几乎都拆了装上船。

两年前,为了建设丹江口大坝,已经有一万多名住在海拔130米以下的浙川移民,分两批南下去了湖北钟祥县柴湖。柴湖通称“大柴湖”。现在轮到海拔147米以下的第三批移民了,共三万多人。

1953年2月19日,毛泽东视察长江,提出“南方水多,北方水少,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?”他用手中的铅笔在地图上久久地指着丹江口一带。在这次视察中,毛泽东明确提出了“南水北调”的设想。五年后,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提议被批准。当年9月,丹江口水库动工。

1967年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。淅川县是丹江口水库重点淹没区。从1966年到1968年,河南、湖北两省共搬迁38万人,淅川县的移民占了20万人。迁往湖北的浙川移民有7.5万人,其中,2.6万人分散安置在当时的荆门市,4.9万人集中安置在当时的钟祥县大柴湖。

有一些人任凭移民搬迁工作队怎么劝都不走,宁愿在岸边搭个草棚住。

原来,早在丹江口水库建设初期,浙川就有一批两千多人的库区移民迁至青海,但适应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。好不容易得以返迁的移民,还未站稳脚跟,又听到搬迁大柴湖的动员通知。

“哪里黄土不埋人,你不走等着喂鱼啊!”眼看着水没过庄稼地,漫到了门槛,涨到了搭的草棚,“钉子户”们也不得不踏上搬迁的船。

船在丹江里走了一夜,转陆路到襄樊之后,再走汉江水路。在路上的时候,淅川县双河村的移民穆文奇不由得开始想象今后的生活。他既想就叫大

